

# 重塑多维空间正义：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实践 与未来延展

贾秀飞

**摘 要：**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具有特殊的发展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成果之一。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差别到二元结构固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的过程，其中交织着政治、经济、资本、文化及权力等多方面内容。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困境构筑了新的问题丛，主要存在三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城乡生态环境差距问题。顺着新问题索引，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给予了城乡关系的空间化分析，其价值旨归以人为核心，指明了城乡发展的规律，暗合了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演进趋势。由于时代区隔导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当下城乡融合的新问题发生了暂时性断裂。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则勾连起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且在要素层面观照了改革开放后城乡空间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人的主体作用不彰，依然没有逃离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体系。因此，新型城乡融合发展要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在此基础上进行路径延展与超越：重视城乡空间身份体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尊重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律。

**关键词：**城乡关系；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城乡融合；空间生产；空间正义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1)04-0016-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4.003

## 一、引 言

中国的城乡关系变迁具备着不一样的发展逻辑与内在规律，城乡关系的变化在空间流变中演绎着中国的实践智慧。城乡关系的演进实质上是空间向度的问题，空间并非为静止的自然地理环境视角下的结构，而是动态的人类活动与各种关系社会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内涵丰富，虽然两者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与城乡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且均给予了城乡关系空间化的剖判。当前关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或空间生产理论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如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权利保障的多元支持方案<sup>[1]</sup>，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分析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空间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我国大城市空间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sup>[2]</sup>。然而其中与城乡关系主题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且相关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互证不够充分，比如以空间生产理论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全过程发展道路<sup>[3]</sup>，忽略了空间生产理论与城乡发展阶段的匹配度，实际上空间生产理论只是片段性地映衬中国城乡发展的某个阶段，过度强调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大城市环境治理现代化实践体系创新研究”（19BSH056）

作者简介：贾秀飞，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无锡分院讲师，xfjia@mail.ecust.edu.cn（上海 200237）

国城乡实践与空间研究的契合，而不去察观微小的差别，不免出现理论与中国城乡实践相割裂的风险。城乡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情形及新时代城乡融合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注，如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所得出的系列问题，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等<sup>[4]</sup>，又有过度演绎延伸的倾向。新时代城乡融合的问题意识并不浓厚，因此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空间相关研究最终也无法真正落地。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给予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启示，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及理论研究难以全面覆盖，存在一定的限定性。由此观之，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空间生产理论放置在中国城乡关系图景之中，特别是在当下的城乡融合新问题下展开研究逻辑，将更加具有意义。回溯中国城乡关系演进实践，有助于撷取新问题丛中主要问题，吸收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空间生产理论的精髓，超越两者存在的限定性，厘正城乡空间的向度，进而找寻新时代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过程与新问题丛

### （一）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迁回望

1. 城乡关系从统一、差别到二元结构固化。传统乡土中国的城乡关系是统一的无差别的，工农一体、城乡一体是中国城乡关系内涵的文化基因，这一关系实质上是乡村关系引领的一种崇尚自然和谐的状态。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与近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旧有的城乡关系的统一、混沌状态被打破，城乡之间的发展脱节，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逐渐进入了差别与对立的阶段。城乡差别与对立的阶段并非是阶级的对立，也不是城乡两者之间彻底的对抗，而是城乡关系发展中城乡差别深化发展的一种割裂形态的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差别与对立依然存在，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给予了重工业发展特殊的待遇。为了聚集工业化发展的资金，农业的发展一直在为工业化发展让步，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导致农业、农村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及城市的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不断地纠偏，试图协同城乡、工农两者间的关系，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虽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但是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农村。1953年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副产品的购销问题，维持工农产品价格适当的比例，城乡之间互依互存的关系初步萌生。但是随后的二十多年的发展，城乡关系却在二元割裂的路途上越走越远，不断扩大的“剪刀差”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和乡村的发展。在这期间陆续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固化，良性的城乡关系并没有彻底形成，这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城乡的发展具备自身特殊的规律。

2. 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统筹发展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末，城乡的二元结构与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时代的趋势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首先在农村得以落地，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符合村民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愿望，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之后改革从农村领域开始向城市转移，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与就业限制不断放宽，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在进行中，种种举措冲击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这一结构不断松动。然而，改革虽然首先兴于乡村，但是政策及资源的支撑却没有到位，相反随着城市的繁荣，资源、人口、资本等不断地涌向城市，特别是在1992年之后，国家为了宏观经济管理与改革，对“三农”实行了“多取、少予”的政策，影响了乡村的全面发展。城乡的二元结构在松动之余也面临着众多的矛盾和障碍，城乡关系的失衡依然存在。2002年，

党的十六大指出城乡要统筹发展,2006年农业税彻底废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变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之后党和政府对于“三农”的政策与资源支持不断叠加,种种利好表明城乡已从二元结构开始向统筹发展转变。

3. 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sup>①</sup>习近平多次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乡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全面迈入了新时代。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可以说,中国的城乡关系从混沌统一、差别与对立,再到统筹发展,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证明了城乡关系的发展过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中不断发展前进的,这一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对于城乡关系发展的持续探索与学习,城乡关系的阶段变化与系列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这一过程依然在路上。

4.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内嵌共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城乡之间发展的“落差”吁求着城乡融合,只有城乡融合不断推进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其中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构成要件,是未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形成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全新的城乡关系。由此观之,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文本、精神及实践路径上内嵌共生。此外,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在不同维度的子结构及要素上具有同构性。2021年3月5日召开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比如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见,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中累积的丰富的成果要沉淀为城乡发展的内生动力,并被逐渐应用到乡村振兴战略中,从而推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发展。

## (二) 新时代城乡融合的新问题丛

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中交织着政治、经济、资本、文化及权力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乡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大规模的征地运动、城乡结合部的“过渡性社区”、失地农民问题、城中村和农民工进城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现<sup>[5]</sup>。此外,诸如城乡间信息鸿沟的存在与不对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及乡村的生态环境挑战等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共同促成了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也构筑了城乡关系的新问题丛。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站上了新起点,城乡之间不再是分离的、割裂的两个主体,相反是共生共荣共长的新型的城乡关系,这一时期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发展,城镇化速度也在加快,而问题丛中的新问题不断聚集、更新与变化。当前,城乡融合主要存在以下三大关键障碍。

<sup>①</sup> 参见陈锡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http://www.12371.cn/2012/12/01/ARTI1354360672137589.shtml?from=groupmessage,2012-12-01>。

第一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新型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必然要以人为核心，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稳定程度、公共服务享受幅度及市民化成本过载等问题互相交叠，致使转移人口一方面难以彻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再回到农村反而又存在重新适应的难题，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归属感、价值感及获得感从根本上落脚在城乡关系中人的定位问题。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城市的扩张中及城市空间中的资源向乡村的渗透中，城乡发展遵循着各自的逻辑，彼此的逻辑也有重合的部分。城乡空间中的市场资本的过度积累及在向乡村场域空间转移中吸引了大量的关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雀跃着”市场的力量，兴奋地期待着城乡的融合发展，殊不知已然忽略了城乡中的真正主体——人的体验与需要。诸如进城务工的村民被冠以“农民工”称谓之后，历经多年的社会融化，依然被视作劳动力而非完整的“人”，无法被充分纳入到城市空间之中。部分村民在“撤村并居”政策中被动上楼，造成了生产与生活多方面的不便，即使部分主动愿意的上楼村民也是在城市的扩张需要与政策的压力、国家战略的限期实现背景之下出现的现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生产、生活的非农化。

第二是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城市的发展、扩展与分化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群、中心城市及资源型城市的枯竭等无不显示着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趋势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充分带动乡村，空间的资源在城乡间分布不合理、不均衡影响了城乡的融合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城市较强的政治谈判能力使得其在经济上很容易促成发展的集聚效应，资本、技术等青睐于城市的机会，而国家也倾向于初期将诸多资源投入到城市，以谋取快速发展的机会，导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不断扩大，而农业、农村的落后反过来必然会限制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资本、技术在城市过度集聚引致了人口的城市化聚集，大城市规模的扩张不得不与城市病携行，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开发强度高、供水不足等。另一方面城市的空间要素，如资本、技术等并不偏安于一隅，而是一直在寻觅扩展的寄居之所，因此其触角也不断地向乡村延伸，然而资本、技术等流向乡村卷走利益之后又部分回到了城市，乡村的某些空间资源被抽离到城市，资本、技术等空间要素并没有彻底在乡村生根。可以说城乡空间资源的流动与分布依然是单向度为主，双向的互动并没有形成，由此导致与城市高速扩张同时并存的，是众多中小城镇长期的发展低迷和文化落后，是乡村的基础设施陈旧、公共服务落后、人才流失、空心化<sup>[6]</sup>。

第三是城乡生态环境差距问题。城市空间生产过剩，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资本不断地寻找低成本的空间域，因此资本、技术等在向乡村空间移动时，其目的并非完全指向社会公共利益，土地在城镇化中成为助推器，“不动产的动产化”撬动金融工具，土地资源的消耗与物质“代谢”的断裂引起了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涉及乡村的水资源、粮食及林地等较多层次的生态资源类别。长期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生态环境治理是农村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村一度扮演着被动接受城市与工业发展转嫁污染的角色，城市一些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有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城市环境的压力不断转嫁，乡村生态环境负荷加重<sup>[7]</sup>。而乡村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生物技术诸如农业、化肥、除草剂及基因工程等过度使用损害了生态环境，生物技术并非总是向善且遵循生态原则的，生物技术的背后往往是资本在城乡之间的空间生产与流动。资本与生物技术的协谋导致部分排放超出区域环境自净能力，再加上乡村整体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比如生活垃圾的转运与处理、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不足等，导致部分地区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此外，农村生态环境意识还有待提升，可以说传统的发展观与价值观并未根本扭转，过度聚焦经济层面的提升，往往会在快速发展中忽略了美丽乡村的重要性。

### 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时代区隔、映现及价值旨归

#### （一）时代区隔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

当下中国城乡关系新问题丛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均衡及城乡生态环境差距等问题横亘在城乡空间之中，对此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由于时代的区隔与限制并没有具体涉及。比如马克思强调了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和共同规律，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某种方式的资源配置过程，但是并未涉及城乡空间中的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污染方面的论述主要散见于自然观、实践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因此目前的城乡生态差距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城乡空间阐述中并未得到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核心政治理论议题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分化下的矛盾与对抗。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所探讨的内容大多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空间观所聚焦的城乡空间问题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彼时的城乡关系历史情境分析的逻辑起点在物质生产上，进而导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乡空间的分析与阐释最终指向了阶级对立，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由于所处时代的区隔，导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中城乡空间思想与当下城乡发展新问题发生了暂时性的断裂，但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中城乡的二元对立到融合，城乡的价值旨归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等文本，描绘出了城乡发展的趋势潮流。时代区隔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城乡空间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精髓与时代区隔并行不悖。

#### （二）城乡关系的空间化映现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集中体现在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上，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做了科学预判，即从混沌、分离、对立到融合，并探讨了城乡空间二元对立的具体映现：等级化与空间分裂。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也即是人类的初期阶段城乡关系并未分立，城乡空间界限是混沌的，虽然此时城市并未出现，但是城乡关系的总貌却不能将城市排除，因为城乡关系间随后发生的分离正是在城乡空间最初的混沌中孕育而脱胎的，且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生产力的极度不发达。正如恩格斯所言，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才出现了“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sup>[8](P23)</sup>。城市的出现，使得城乡空间之间的混沌状态被打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差别开始逐渐显现，这一过程伴随着分工条件的出现及分工现象的嵌入，城乡关系的分离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对立阶段。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病，具体映现于城乡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生活习性等方面。首先城市的空间等级发生了变化，等级体系更加鲜明，工人阶级居住在肮脏的区域，中等资产阶级居住在整齐的街道上，高等资产阶级则居住在舒适的房屋或华丽的别墅里<sup>[9]</sup>。其次城乡空间发生了分裂，“由于城市大大膨胀，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也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sup>[10](P195)</sup>。城市大量耗费的资源（衣食住行）无法再回到乡村土地，乡村空间中曾经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发生了断裂，土地变得愈发贫瘠。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这是城乡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sup>[10](P215)</sup>。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中关于城乡之间的对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判断等，与中国的城乡关系演进过程相吻合。中国城乡关系实践经历了从城乡分离、差别到城乡二元结构，从城乡二元结构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图景变迁，以至于城乡分离、对立造成的系列流弊在中国发展大幕的上演，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实践不断

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与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互相映衬。

### （三）以人为核心的价值旨归

城乡空间从二元对立逐步迈向融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城乡空间演变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人的发展也是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主体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城乡空间二元对立与尖锐化蕴含着城乡关系融合的基因。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选择城市或乡村生活，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人不再屈从于城市或乡村的分工，劳动不再是“异己”的存在，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sup>[11]</sup>。而城乡融合与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将为旧的分工的消灭、私有制的废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城乡关系也必将逐步由对立走向融合<sup>[12]</sup>。城乡空间演变与生产力密切相关，在城乡差别走向对立的过程中，城乡空间之间的相容利益在扩张，城市集聚的资源、技术等先进生产力要素也会返流于乡村之中，促进了乡村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且城乡间的二元隔离的利益不断发生触碰交叉，最终有利于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因此，在城乡空间中生产力的发展作用可谓无处不在，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城乡关系走向融合的内源动力，从根本上推动着城乡关系的发展与蜕变。在城乡空间的融合的具体举措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合理利用与分配生产力。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产品足够丰富、盈余后，满足了每个人充分的物质上的需求，人们才有可能去享受精神产品，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sup>[10](P150)</sup>。合理分配空间生产力则意味着工农业生产要在全中国均衡分布与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可以说通过合理的分配生产力解决了城乡空间工农业等产业的错位、互侵等问题，提升了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促进城乡间的融合。其次，城乡空间融合要废除私有制，消灭分工。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废除私有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未来城乡融合社会目标的必要条件。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方法论中还涉及一些其他值得思考的举措，比如发挥中心城市的积极作用、平衡地布局大工业、工农业结合发展、重视科学技术等内容，这些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举措有利于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促进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

## 四、空间生产理论的时代勾连、新问题从回应与限度探究

### （一）空间生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轴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对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实践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科学性不容置疑，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其关于城乡融合的一些具体举措虽然给予了我们启示，但是与当下城乡关系的实践及城乡融合面临的新问题显得不是十分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创新又蕴含着理论层面的革新。“20世纪的社会理论历史是时间和空间观念都缺失的历史”<sup>[13](P505)</sup>，20世纪60年代开始整个学界的研究热点开始了空间上的转向，正如福柯所言，“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感知和经历的世界正在成为一种时空节点的相互联接”<sup>[14](P18-28)</sup>。以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泰尔斯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正在成为资本主义进行危机转移的“载体”，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将研究的视角触及了空间，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多领域的研究聚集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对于资本、市场主导的城乡关系及内部活动形式进行了空间维度的批判，阐释了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资本的积累以新的面貌再次呈现，空间理论在时空中得到了勾连。

1. 空间的资本形塑机理。在空间形塑上，强调了资本的流通，而资本的流通与资本的积累密切相关。列斐伏尔认为“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资本第一循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寻求新的流通方式，即资本转向对建成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的投资，进而推动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资本第二循环）。由于资本转化的暂时性和循环性，使得资本积累创造的城市空间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隐藏了一定的城市危机（城市无序扩张和大拆大建），进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条件”<sup>[15](P46-53)</sup>。由此可见，资本的循环积累必须要发现新的流通方式，两者互相作用，共同作用于空间生产。哈维进一步拓展了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之说，过剩的资本一般借助城市建设等生产类项目保持暂时性的稳定，寄居于空间之中，换取资本再次“变异膨胀”的时间。哈维阐释了资本与城市化关系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工业生产过程是资本首次循环的自然成果，生产部门的危机推动着城市发展。第二阶段则是溢出的过剩资本开始嵌入于空间之中，被视作土地资本或者成为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资本镶嵌在城市的建成环境之上，城市成为了人类改造的“第二自然”的一部分。第三阶段则是资本开始向科学技术及与劳动力再生产相连接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渗透，资本在这三个阶段中不断地循环、流动，不知不觉地在形塑着城市的空间。

2. 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交融。空间并非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结构体系，在空间中充满着各种社会关系，不仅如此，空间也在生产着社会关系。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表征着空间的社会性，而社会性进一步决定着空间的政治性。列斐伏尔认为在城市的空间中包含着各种社会性、政治性的关系，比如居住空间的差异、空间的等级结构及人际距离等。哈维概括了空间的三种性质：“可接近性与距离、空间的分配与使用、空间的控制”<sup>[16](P262)</sup>。不仅如此，哈维还将阶级关系与分析引入到空间之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空间关系浸透着阶级含义，空间受到性别、种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sup>[16](P264)</sup>。可以说，内含着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城市空间已然成为了一个抽象的空间，成为了一种商品，可以标示身份，甚至成为了国家机构的一种工具。阿德尔纳·约翰·雷克斯在《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中指出城市是被构建的一种环境（Created Environment），其中住宅在对阶级的形成与阶级的冲突矛盾发生等方面推波助澜。不同的住宅拥有者体现着阶级差别，背后充斥着各种权力关系，权力与市场的交错使得住宅成为了阶级差距的象征之一，同时也在阶级、政府及民众之间埋入了矛盾冲突的引线。

3. 空间的流动与全球化网络社会的形成。信息技术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的同时也冲击着空间，空间彻底成为了流动的空间，世界舞台给予了资本及空间新的充分展示的机会。原来资本的循环与流通作用构筑的空间边界（本身较为模糊），此时彻底消散，时空被不断地压缩，地理性地点的标示作用逐步被弱化，网络社会的全球化趋向不断发展深化。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世界经济、政治及权力的共同作用的对象，空间的权力“几何学”使得权力在全球城市空间以几何级的速度蔓延，加剧了地理空间上的资源不平衡与等级的不对等，导致出现了大量的“空间极化”现象。“富人堡垒型社区、绅士化社区、城市群、居民空间分异、边缘城市、城中村、贫民窟等都是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典型表现”<sup>[17](P23-42)</sup>，世界网络社会的发展与空间的流动在发展中国家同样上演，发展中国家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城乡之间发展的空间不对等与空间的流动密切相关。

## （二）新问题丛回应与存在的限度

资本、空间的变动（社会性与政治性）及空间等级差彼此互相作用影响，成为当下中国城乡空间新问题丛得以产生的重要催化因素。“城市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建构的环境，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sup>[18](P15-16)</sup>。中国的城乡关系体现的是城乡空间的与社会化的变迁，而当前资本的作用已经成为了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的发展与乡村的城镇化是资本在城市积累之余的主动“逃窜”，资本嗅到了利益的味道而开始跑步进入乡村的场域空间。“乡村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

济和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市场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整理和安排”<sup>[19]</sup>。资本的变异形式与寄居物也逐步多样化，借助乡村土地、消费及自然禀赋，资本塑造着乡村空间。资本的过度积累引发了系列城市问题，如住房、医疗、生态等问题，而国际资本的逐利性更加突出，随着国际资本的闯入，资本主义的空间转移与危机的空间修复进一步将中国城乡空间中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纳入空间生产过程，涌现出的各种现象不断组合、裂变为新问题丛中的问题。城乡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及城乡生态环境差距等问题无疑都与资本密切关联，资本导引了资源城市化的单极流动，资本对于利益的追逐则损害了城乡之间的生态平衡。此外，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交融导致城市中居住的空间等级差异也逐步进入乡村，打破了乡村本身在居住意义上的平等性，传统乡土中国的村民居住空间并没有严格的空间等级化倾向，而现代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在资本的流通与作用下也开始影响乡村的社会关系与身份建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涉及市民化权利的共享与城乡间发展红利的转移，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及与资本的链合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空间结构与空间秩序，乡村中农民权利的缺失、强制拆迁、补偿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了城乡新问题丛中的时而上演的剧目。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的城乡空间的崭新变化及面临的新问题丛提供了分析和阐释的视角，比如在中国城乡空间的变化上，主要体现于片段的要素层面（如资本、技术、权力及身份等）回应与观照，集中在改革开放后城乡空间的变化上。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进一步释放了资本、劳动力与发展空间，城乡关系的二元性界限逐渐模糊，1988年的土地和住房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开始引领城乡关系的走向。1990年之后，空间生产在城乡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本推动着城镇化，土地财政进一步助推着资本的城乡循环与流通。当下城乡融合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都需要以人为基驾驭城乡空间，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更加不能忽视农业人口在城市中的多层次立体的身份体验感。可以说，新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叙事的重笔描绘与分析，使得城乡空间中的真正的行动者与体验者被动的“静止化”，主体作用不彰。此外，空间生产理论对于空间的资本、政治权力及社会性的笔笔刻画并不能撇开其研究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体系之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无法彻底撇去资本主义的某些要素的影响，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空间生产的多元要素也将附带社会主义的性质，政治权力、资本及技术等在中国并不具有无限扩张的权力，必然会受到中国的国家性质与政治结构这一更大政治空间的制约和驯化。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空间理论过度强调空间生产、空间资本及空间冲突等内容，但是它偏于宏观的理论推导，缺乏实证研究和事实依据的支撑，“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忽视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作用”<sup>[20]</sup>。空间生产理论过度聚焦于空间及空间中的要素，忽视了人的主体作用，缺乏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人文关怀。

## 五、多维空间正义：新型城乡融合发展的延展与超越

### （一）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

当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问题丛本质上是城乡空间发展的不对等，诸如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城乡生态环境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城乡空间隔离、空间排斥及空间使用价值不彰等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论及了城乡间的二元对立与空间分裂，并对城乡的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预判，其价值主旨以人为核心，在空间观中对于城乡空间变化的驱动力——生产力及具体的城乡融合举措进行了思考。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体现在对于城乡融合趋势的预判及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关系调整中所运用的某些举措，例如重视科学技术、工农业的融合发展及平衡布局大工业等。然而囿于时代的区隔，如今城乡发展新问题丛中的众

多问题及城乡空间中的新要素（资本、技术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没有具体涉及。顺着新问题丛的指引，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城乡空间中的资本、空间特性、空间流动及内部机理进行了空间维度的批判，勾连起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空间生产较为生动地匹配了改革开放后城乡空间的变化，特别是城镇化中资本在城乡空间中的再生产与流动、国际资本的进场等。当然，由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将生产场域过度偏移至都市，根本上缺乏人在城乡空间的主体性体验，并没有抓住城乡融合新问题丛中的关键，即人的主体作用，因此只能是片段性地回应中国城乡空间的变化实践。

面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定位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既存在科学性、前瞻性，又内含自身的限定性。新型城乡融合发展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精髓，修正并突破所谓的限定性，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破解当下城乡融合面临的新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包含多重含义、多个维度的社会实践过程，在空间生产层面须充分体现城镇居民享有的公平正义的空间关系<sup>[21]</sup>。因而，空间正义不应是简略的城乡二分法，而应致力于统筹城乡空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多维空间，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综合平衡，如图1所示。多维空间正义以人为核心，呈现开放的结构布局，且不断地在进行吐故纳新。政治空间层面重塑城乡空间地位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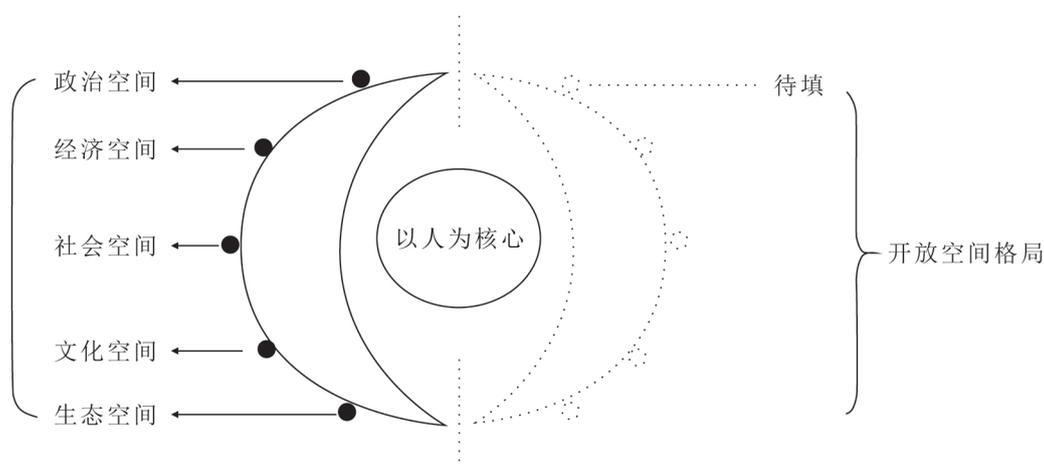


图1 城乡融合多维空间正义图

对等与权利的缺场，在顶层设计方面要逐步纠正城乡空间的错位，辅之以相关的重大政策支持，例如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城乡空间的等级化趋向愈演愈烈会导致就业、收入、教育等权利的极化，因此政治空间还要有效地容纳城乡政治参与和相关利益诉求。经济空间则要规制资本与权力的链合。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空间因对资本和物质的过度崇拜，城市空间已经被“物化”，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与垄断造成了资源配置的相对失衡，导致对农村地区等空间资源的剥夺<sup>[22]</sup>。如不适时规制资本与权力，城乡间的资源配置与流动、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差距将越来越大。社会空间则聚焦城乡空间的社会融合问题，防止阶层的断裂、固化及空间性贫困带的形成，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资格准入等方面齐头并进。文化空间则要彻底翻转城乡不对等的理念，撇去城乡空间中弥漫的冷漠与心理隔阂，实现城乡文化的内融与互促，城乡空间应都可以安然地放置个体的乡愁记忆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态空间要促成城乡间生态一体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空间要科学留白，防止经济发展借助城镇化东风过度压缩生态空间，要充分保障城乡个体的生态公平权。

##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延展与超越

在多维空间正义的统摄下，新时代城乡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将会逐步破解，例如在政治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多重交叉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经济空间有利于城乡资源及公共服务配置的合理化，而生态空间则有利于弥补城乡之间的生态差距。城乡融合多维空间正义的重塑有效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精髓部分，适应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多维空间正义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方法论，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之上，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延展与超越要体现多维空间正义的内核，即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同时对接国家顶层战略设计，尊重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规律。

城乡空间的身份体验：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关系是否和谐关系到城乡空间的体验主体——人民，城乡的空间生产、城乡间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城乡空间中的人的获得感。城乡的分离与对立不仅仅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城乡分离与对立将导致城乡的人分离为两大空间区域的孤独的独居“动物”。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是全面的对立状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要求抛弃传统的旧式的只重视区域的指标数值式发展，而忽略人的主体幸福的发展模式。马克思指出，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而城乡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sup>[23]</sup>。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脉相承且始终惯行如一的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与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文关怀与使命担当。城乡融合的最终价值指向在于时刻关注并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重视城乡空间中真正的最重要的主体——人的体验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进民生福祉，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就是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推动形成人口有序流动、产业有序集聚的城乡融合共享发展新格局，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sup>[24]</sup>。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四五”乃至未来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其深度、广度及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相关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再次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其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整体改组而来，表明集中优势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振兴乡村开启了城乡融合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系列顶层设计与重要文件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脱贫攻坚的硕果，城乡融合又与乡村振兴内嵌共生，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的同频共振的核心就是要判辨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呈现正相关性，一方面城乡深度融合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比如激活沉睡的乡村资源，促成生产要素在城乡空间的自由流动，其中农村三产的融合本质上属于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要素、资源、产业及人的融合将会拓展乡村的发展空间。另外一方面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凭借，也是可以依托的重大国家顶层设计，乡村振兴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和红利。乡村振兴涉及诸多系统性问题，诸如农业生产能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开发资金扶持、农业专技人才培养、涉农信息分享及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挑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极大地促进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其次脱贫攻坚也将助力于推动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脱贫攻坚附带的众多国家惠农利好政策也将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力，激发贫困地区人民的积极性与对城乡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有利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有着系列成熟的可借鉴的经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开花结果最终要落实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因此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未来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新时代要全面发力推动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实现二者之间的同频共振,激发出城乡融合的诸多关键要素、资源,助力于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尊重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律。城乡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最大的特性就是动态性。城乡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城乡关系要不断地依据实情去动态调整,以更加适合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城市化的需求。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关系,党和国家根据现实的需求和生产力发展实情进行了动态化的调整,动态化的调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较为快速地提升国家的实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心,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及城乡的户籍制度等都是为了辅助重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党领导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开展互助合作,对改变农业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不懈探索,虽历经波折,但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sup>[25](P13)</sup>。1961至1965年采取了系列措施,在农业方面调整所有制结构,纠正平均主义,恢复自留地,乡村中的公共食堂进行了解散,工业方面调整了工业结构,开始注重对于轻工业的投资。1966至1976年,动态调整的探索的政策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搁浅,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加剧。1978年之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乡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乡村及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后,改革与发展的重心再次移至城市,本来驻足不久的乡村资源、政策优势等开始逐步整合进城市的空间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与城乡间不平衡的加剧,之后召开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相继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由此回观,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党和国家根据城乡发展的实践情形所进行的应对性调整,体现了对于城乡关系发展的动态规律的尊重与驾驭能力。

#### 参考文献

- [1] 马伟华,张笑语. 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权利保障的多元支持[J]. 广西民族研究,2020(6).
- [2] 刘继华,段斯铁萌.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我国大城市空间治理的启示[J]. 城市问题,2019(2).
- [3] 胡博成,朱忆天. 从空间生产到空间共享: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嬗变逻辑[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4] 曹莉莉,林滨.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研究[J]. 理论导刊,2020(8).
- [5] 陈然.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J]. 理论与现代化,2016(6).
- [6] 吴莹.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历程、变迁与反思[J]. 社会学评论,2019(6).
- [7] 王桂芹,郑颜悦. 我国城乡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江淮论坛,2020(5).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张翠. 马克思主义与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观比较[J]. 山东社会科学,2018(9).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傅歆,孙米莉.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逻辑演进[J]. 浙江学刊,2019(6).
- [12] 李邦铭.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J]. 河北学刊,2012(2).
- [13] [英]布赖恩·特纳. 布兰克威尔社会理论指南[M]. 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4]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5]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6] Harvey, D. *The Urban Experience*[M]. Oxford UK&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9.
- [17] Sassen, S. Rebuilding the global city: Economy ethnicity and space[A]. Anthony D. K. ed. *Re-presenting the*

- City; Ethnicity, Capital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etropolis*[C]. London: Macmillan, 1996.
- [18] 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1985.
- [19] 毛丹. 村庄的大转型[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10).
- [20] 夏建中. 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J]. 社会学研究, 1998(4).
- [21] 陈忠. 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与集体行动的逻辑[J]. 哲学动态, 2010(6).
- [22] 陆小成. 空间正义视域下新型城镇化的资源配置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 2017(1).
- [23] 邬巧飞. 马克思的城乡融合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科学社会主义, 2014(4).
- [24] 邓金钱. 新中国 70 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 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5).
- [25]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Reshaping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Justice: 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Future Extens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

JIA Xiur-fei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has a special development logic and is also one of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has experienced change from unity, difference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dual structure, and then to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hich results in new problems and obstacles, namely,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the unreasonable and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resources,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find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Marxist spatial view gives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ts value aims to take people as the core, point out the law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mply the evolution trend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Due to the separation of times, Marxist spatial view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temporary break. The new Marxist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connects the Marxist view of space, and responds to the changes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t the factor level. There is still no escape from the capitalist system framework system. Therefore, the new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calibrate the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orientation, reshape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justice, and carry on the path ex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 on this basis, that i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identity experience; realize the same frequency reso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respect the dynamic law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Marxist spatial view;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spatial justice

(责任编辑 孙 洁)